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0 年度项目

3-32

F327.73

5-3

开拓贵州农村市场需求空间 及其政策指向

项目负责人：卢同新

项目组成员：王育春 谢湘能 邓小宁

2001 年 3 月

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是贵州农村摆脱贫困的重要前提

本文是卢同新同志承担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开拓贵州农村市场需求空间及其政策指向》中的一部分，该课题已经过专家鉴定验收。课题中对我省农村摆脱贫困，实现农民增收、启动农村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是贵州农村摆脱贫困，实现农民增收、启动农村市场的重要前提的观点，现予编发，以供参考。

目前，我省农村贫困面还很大，贫困程度极深，1998年我省农村贫困人口387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2%，近年来由于政府扶贫工作力度的加大，贫困人口逐渐减少，但扶贫工作仍任重而道远。1999年在我省48个贫困县中，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村人口仍有571.6万人，相当部分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

针对贵州农村贫困现象，我们始终认为，贫困涵盖两层含义：一是物质贫困，二是文化贫困。而文化贫困之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往往具有长期的主导作用。由于人力资本长期投入积累不足，造成了当前农村的二元贫困。为了说明我省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可以通过城乡比较加以辨析。

1999年我省城市人均用于文教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为445.59元，农村人均仅为83.81元，城市是农村的5.3倍；医疗保健方面，城市人均消费支出为153.32元，城市是农村的6.5倍。由于人力资本长期投入不足，使得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1999年我省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2.43%，小学文化程度占37.50%，初中占34.49%，高中占4.57%，中专以上约占1%，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03年。在开放的市场

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优劣，越来越成为左右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据一份调查报告对贵州罗甸县、山西代县、辽宁凤城县、浙江磐安、河南商城县、甘肃定西县等6个贫困县5048个农户资料分析，在造成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差异的众多因素中，家庭劳动力“平均文化水平”相对于家庭劳动力的“平均体力”更为重要。据测算，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家庭收入就增加53.24元，按家庭人均收入1000元推算，收益率为5.32%。文化素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显而易见。

目前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约650~700万人左右，存在着事实上的隐性失业。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引导贫困地区农民更多地向非农领域转移，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从政策上拓宽了农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门路。如最近在贵阳就举办的首届农村劳动力劳务交流会，其场面极为火爆，确实让人感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流动的愿望。但与政府的热情和农民热切的愿望相比，交流结果令人沮丧。这里仅摘录贵州商报头版新闻标题：一条是第一天刊登的“首届农村劳动力劳务交流会一万人云集挤破门”；另一条是第三天刊登的“仅有力气是不够的”。其含义不可谓不深刻。用人单位反映本地民工与外省民工相比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只有力气而无技能成为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较为普遍的特征，也成为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由于与外地民工相比，我省民工处于人力资本的劣势，在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优胜劣汰的规律迫使我省民工退出市场，确实让人遗憾而无奈，而问题的背后，也反映出劳动力低劣的文化素质及技能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大障碍。

农村人力资本的低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而且对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不利影响。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原来

持续高涨的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乏力现象。1999年我省农村家庭每百户乡村企业从业人员仅0.63人，比1998年有所下降。按照产业资本与人力资源匹配原理，乡镇工业要想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需要优化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然而与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相比，农村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显然不能满足农村二、三产业优化结构、提高技术层次的需要。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为了今后我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大政府对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而对农村扶贫的重点，应主要考虑向文化扶贫倾斜而不是向物质扶贫倾斜。我们认为，文化贫困不同于物质扶贫，尽管说它源于物质贫困，但却比物质贫困有着更大的消解难度。充分评估我省农村贫困的性质和特点，对于找准扶贫的切入点，提高扶贫工作的质量是很重要的。政府的反贫困思路，应立足于建立一种能够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而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则是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说产业资本的投资会受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的话，那么投资于教育的资本只要运用得当，往往会收到边际效率递增的效果。目前我省农村教育基础还相当薄弱，使大批农村青年丧失了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政策要在坚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对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增加农村高中学校数量，鼓励社会办学。此外，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农业技术推广和信息交流等形式，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0 年度项目

开拓贵州农村市场需求空间 及其政策指向

项目负责人：卢同新

项目组成员：王育春 谢湘能 邓小宁

2001 年 3 月

引 言

经过 20 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步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转变，市场需求增速减缓，并开始制约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当经济由“短缺经济”转为相对的“剩余经济”时，增长的机会和投资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弱。要使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源或拓宽原有的经济增长渠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寻求国内的经济增长源，二是开拓国外市场。即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来拉动。虽然近年来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渐趋缓解，对外贸易显现出良好的回升态势，但从 GDP 构成看，出口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就贵州而言，外贸净出口 1999 年为 13.9 亿元，占 GDP 总值约 1.5%。针对国内需求不振的市场形势，中央和地方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扼制经济的下滑势头。货币政策方面，连续降低利率，增收利息税，以鼓励投资和消费；财政政策方面，国债和各种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发行达到了创纪录水平，采取了加大国家投资带动社会投资和需求的措施；在收入政策方面，大幅度地提高了国家公务员和城市部分居民的薪金水平，以此希望刺激陷于疲软的消费需求。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运行平稳，说明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取得实效。根据贵州省统计局近期发布的综合数据显示，我省经济正出现稳定回升的势头。但从市场形势看，国民经济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需求不足的特征。1999 年贵州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3%，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 1%，而居民消费仅增长 4.3%，处于 90 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水平。经济理论认为，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要使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得到社会需求（居民需求）的足够支撑，特别是农村需求。从贵州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最终消费占 80%，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劳务净出口占 20%；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 80%，政府消费占 20%；在居民消费中，

农村居民消费占 60%，非农居民消费占 40%，作为落后的农业省份，农村庞大的消费基数，历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因此可以说，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需求，不仅应是当前而且更应该是长期不可偏废的政策取向。据国家计委相关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农村居民每实现 1000 亿元最终消费，将对国民经济产生 2356.4 亿元的间接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 1253.2 亿元，农业部门投入 619.7 亿元，第三产业投入 478.3 亿元，建筑业投入 5.2 亿元。可见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拉动作用。在当前外需乏力，国内城镇市场消费渐趋饱和的形势下，把开拓市场的着力点放在农村，显然十分必要。

第一部分：贵州农村消费现状及市场扩张空间

一、消费总量的城乡分布

贵州 80%以上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在人口的分布上，乡村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消费品市场的分布却与此相反。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目前农村地区所占份额从 1997 年的 25.4%下降到 1998 年的 24.2%，1999 年度更降低至 23.6%，低于改革开放以来 20 余年中的任何时期。农村市场地位的弱化由来已久。1978 年，城镇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份额为 69.9，到 1999 年则上升为 76.4%。就是说，不足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群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

改革开放以来，在消费市场方面，我省农村地区的地位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变化阶段。

80 年代中期以前，即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改革主要在农村地区进行，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产，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迅速稳步提高。农村地区在全省消费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份额显著上升。

1978 年到 1985 年，在居民最终消费中，农村地区所占份额从 65.3% 上升到 70.8%，上升幅度较大。

80 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省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都比前一阶段有所放慢，农村地区在居民最终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从 1985 年有 70.8 下降到 1999 年的 47.1%，降低近 24 个百分点，大大低于改革初期水平，说明农村地区相对消费水平已出现严重萎缩。

农村地区在全省市场中的份额变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城市化，二是城乡居民相对消费水平，尤其是城市化对农村市场地位的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人口城市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村市场缩减是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经研究发现，贵州农村市场消费份额自 80 年代中期后出现的大幅度萎缩，并非与农村城镇化发展直接相关。1978 年贵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数的比重为 88.61%，1985 年的比重为 87.91%，1999 年的比重为 85.7%，可见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相当迟缓，几乎处于相对停滞阶段。与全国相比，我省农村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改革开放 20 余年，全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从 1978 年的 18% 提高到 1999 年的 33%，而现阶段贵州城市化水平仅为 18%^{〔1〕}，横向比较说明，贵州城市化水平整整落后全国 20 年。

以上分析可知，贵州农村市场地位下降并非前述第一种因素所致，而是与城乡居民相对消费水平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增幅下降有关。在我省人口城市化比率较低且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形下，在第一阶段即 1978—1985 年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相对消费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使得农村市场所占份额有所提高。而在第二阶段即 1985 年以后，同样是在全省人口城市化比率较低的情况下，农村市场份额出人

^{〔1〕} 此数据引自“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我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第 17 页。

意料地大幅下滑，说明城乡之间消费水平的差距正逐年拉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加剧。

1978-1985 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 2.8 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2.6 倍，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使农村地区在全省消费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份额显著上升；1986-1999 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4.5 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 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由此造成农村消费总量和市场地位的下降。

农村市场地位的此消彼长，既然是因收入因素而非城市化因素引起，因此可以说，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民收入增长，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村消费总量。但这里并不是否定城市化影响对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作用。相反，从长远来看，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消费总量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比重一定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所证实。我们只是认为，从贵州目前的城乡人口比例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看，只要调整收入政策，大力改善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环境和其他相关基础条件，农村消费市场在总量上的扩大是完全有可能的。

贵州消费品市场的城乡走势

表 1 (1978-1999 年) 单位：%、亿元

年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	乡村	城镇份额	乡村份额	城镇人口比率	农业人口比率	农民相对消费水平	全国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水平
1978	21.23	14.83	6.40	69.9	30.1	11.39	88.61	0.34	0.50
1985	52.25	35.58	16.67	68.1	31.9	12.1	87.90	0.36	0.69
1990	85.90	59.44	26.46	69.2	30.8	12.26	87.74	0.35	0.66
1995	191.67	145.48	46.19	75.9	24.1	13.52	86.48	0.28	0.61
1996	233.48	178.16	55.32	76.3	23.7	13.87	86.13	0.28	0.62
1997	265.48	198.14	67.34	74.6	25.4	14.04	85.96	0.30	0.61
1998	289.92	219.73	70.19	75.8	24.2	14.04	85.96	0.28	--
1999	313.79	239.61	74.17	76.4	23.6	14.25	85.74	0.26	--

注：①农民相对消费水平等于乡村市场份额与农业人口份额之比，这一比例数字越低，表明农民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越低；

资料来源《2000 年贵州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局：《贵州五十年，1949-1999》

二、市场化发育水平

农村联产承包制大大激活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各资源要素得到有效合理配置。随着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样化的逐步推进，贵州农村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城乡集贸市场繁荣，市场半径和交换范围逐步扩大，农民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现金收入人均从 1978 年的 62.92 亿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295.55 元，增长 20 倍，现金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从 58%提高到 95%。货币消费（生产费用和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从 1978 年的 52 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816 元，增长 16 倍。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大体上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为主向商品经济为主和从计划经济为主向市场经济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但相对于城市市场，农村市场化发育仍处于较低水平。

1980年~1999年间，农村集市数从1998个发展到2419个，销售金额从5.5亿元增加到89.23亿元，从农村集市销售金额的绝对值看，20年间增长了16.2倍。与城市集市贸易发展相比，农村集市具有数量多，小而分散，贸易规模较小的特征。1999年，贵州城市集市数仅占城乡集市总数的15.6%，而贸易成交额却占总成交额的52.6%。由于农村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农村集贸市场已经逐步呈现出相对减弱的趋势。由于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农村市场近年来已显现其疲态，乡村集市数从1998年的2457个减至1999年的2419个，同期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减少9.52亿元。

工业品消费方面，目前我省农村的商业销售渠道绝大部分依靠私营和个体经济来组织。由于规模小，经营成本高，同样的商品销售价格一般要高于城市，而且商品品种单调，农民可选择余地小。一项调查证实，农民所需的消费品有很大部分要到外地购买。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70%以上的农民要到地级市或省城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市场的发育不足。就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依靠分散的，实力很小的、素质不高的个体商业，不可能促进物流、商流的“大进大出”，难以满足农民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当然，从规模效益考虑，中型以上商业企业在农村的分布，必然受到市场需求支配，目前这种市场分配格局，也许具有更好的规模效益和生存潜力，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到很远的地方购物毕竟很不方便，它不仅会降低农民的消费热情，而且也会影响农民消费特别是货币性消费的增长。

我省农村市场发育水平低下，与政府长期推行的二元消费政策密切相关，从全局看，我国国民经济的消费政策一直是以城市为导向的，相对于农村，城市居民收入高，消费需求旺盛，城市商业基础良好，流通条件优越，售后服务完善，第三产业发达，城市消费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巨大增长。受此影响，各生产企业和商业流通企业都把开拓市

场的眼光盯在城市市场。而农村市场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档次低，人口分散，交通闭塞，消费环境差，有的市场还停留在原始的集市贸易甚至易货贸易阶段。因此对于市场的需求，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很少关注，更少引导开发，从而造成城乡市场的封闭运转。相互的辐射功能，吸纳功能，互补功能得不到发挥。城市多余的产品无法流出，农民需要的城市工业品难以购买，在城乡市场分割和两极分化条件下，农村消费总量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终究难以避免。

三、储蓄倾向

农村地区在全省消费品市场份额缩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收入水平下降的同时，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民的储蓄倾向偏高。

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农村居民储蓄余额增速比较

表 2 (1991 年—1999 年)

年份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环比增长（%）	农村居民储蓄余额（亿元）	环比增长（%）
1991	465.53	--	11.32	--
1992	506.13	8.7	14.93	32
1993	579.67	14.5	19.15	28
1994	786.84	35.8	25.97	36
1995	1086.62	38.1	33.33	28
1996	1276.67	17.5	37.84	14
1997	1298.54	1.71	45.18	19
1998	1334.46	2.8	57.05	26
1999	1363.07	2.1	63.52	11.3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局：《贵州五十年，1949-1999》、《2000 年贵州统计年鉴》

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农民收入呈现较大幅度的减弱趋势。上表可见，自 1997 年后，农民收入的增幅一直在低位徘徊，而从农村居民储蓄余

额的增长水平看，虽然近十年来也出现较明显的下滑趋势，但总体上看，储蓄余额的增幅一般都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而且一直保持二位数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农民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国家连续调低存款利率和加征利息税的情况下，1999年贵州农村居民储蓄余额也比上年增长11.3%。因此从目前我省农村居民具有的较高储蓄增长水平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对消费环境以及对未来收入和支出所持有的悲观预期。消费经济理论认为，规避风险是人的一种基本心理倾向，并对人的消费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一个社会中那些降低人们生活风险的保障制度越是健全，人们就越敢于消费。在消费和储蓄的关系上，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越大，居民就越是倾向于多储蓄，以降低以后的生活风险。农民是我国抵御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其风险程度，减少其未来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其消费行为的。

有关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定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与可以预计到的未来收入，即“持久收入”密切相关。从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看，我省农民的“持久收入”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农民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越多，储蓄倾向便会越高。储蓄增加的代价自然是压抑即期消费，甚至降低从前的消费水平。

此外，在农村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背景下，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差异，使得农村储蓄在城乡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出现历年下滑的趋势，1978年农村居民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0.1%，1999年，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金额为484.51亿元，农村居民存款仅为63.52亿元，占城乡储蓄总额的13.1%，城镇居民储蓄存款是农村居民的6.6倍。不难看出，占总人口不够20%的城镇居民在消费方面拥有绝对的资金优势。如果考虑我省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再考虑这些储蓄在农村居民内部的非均衡分布，可以断言，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是微不足道的。

四、消费结构

①恩格尔系数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这是一个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律即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也进而成为用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情况及消费结构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改革 20 余年来，总体上看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1999 年是 1978 年的 12.5 倍，由此导致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恩格尔系数变动幅度较小，仅在 4.35% 的范围内波动。恩格尔系数最高年份为 1996 年的 72.51%，最低年份为 1992 年的 68.16%，1999 年又基本回到改革初期水平。（见表）。

贵州农民恩格尔系数影响因素变动情况

表：3 (1978——1999 年) 单位%

年份	恩格尔系数	纯收入实际增长	生活消费名义增长	零售物价指数(上年=100)	食品物价指数(上年=100)
1978	69.26	3.5	7.1	--	--
1980	69.27	23.2	1.9	103.7	109.0
1985	69.85	14.9	2.2	105.1	108.6
1990	69.91	1.1	-1.0	102.5	102.1
1991	68.17	6.9	4.2	103.3	108.6
1992	68.16	8.7	8.1	106.6	111.0
1993	70.98	14.5	21.0	116.1	119.1
1994	70.79	35.7	24.3	123.3	130.4
1995	71.12	38.1	35.7	120.1	134.3
1996	72.51	17.4	14.7	106.5	108.6
1997	69.64	1.7	-0.2	101.7	100.5
1998	69.22	2.7	2.6	98.8	98.7
1999	67.50	2.1	-2.2	97.9	97.1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局：《贵州五十年，1949-1999》、《2000 年贵州统计年鉴》

恩格尔定律实质说明，随着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

存资料的需求将趋于饱和，而相对于享受资料 and 发展的消费需求则逐渐上升。根据我省农村恩格尔系数的历年表现，即农民纯收入增幅较快的年份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而农民纯收入增长较慢的年份恩格尔系数则保持较低水平。这是否意味着恩格尔定律不适合我省农村居民的情况，或农民的消费结构正向相对劣化的方向转型呢？其实不然。据相关研究表明，导致恩格尔系数变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的 actual 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消费者在其 actual 收入水平提高后，在满足生存消费的前提下，恩格尔系数将呈下降趋势；二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率与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率的涨幅比率。如果食品价格的涨幅大于其他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幅度，在农民自给性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上升；三是农村居民食品内部结构的改善提高了食物消费水平，如家禽及畜类产品消费量的增加，也会导致农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动。

根据上述影响农民恩格尔系数变动的三个主要因素并结合前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 1978 年以来，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只是增幅极不平稳，波动较大。此期间恩格尔系数表现相对平衡，并伴随出现一些非理性化的怪异特征。即恩格尔系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大小呈正向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是 1994 和 1995 两年，这一时期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最大的两年，也是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两年。而在 1990、1997 和 1999 这三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慢的时期，也是恩格尔系数最低的时期。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我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长期居高不下，似乎与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无关。从表 3 可以看出，考察期间大多数年份食品物价指数和零售指数呈现规律性变动，且食品价格涨幅几乎全面高于消费品物价涨幅。一般地，在食品物价涨幅较大的年份恩格尔系数较高，涨幅较低的年份恩格尔系数较低。仍以 1994 年和 1995 年为例，这两年食品物价涨幅最大，恩格尔系数也相应较高，1997 年到 1999 年食品物价出现

负增长，其间恩格尔系数又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改革初期水平。说明造成我省农村恩格尔系数长期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上述后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在食品价格和农村居民食品内部结构调整和改善的双重因素推动下，使农村恩格尔系数在消费结构中始终维持较高比重。

贵州农村居民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

表 4 (1978 年—1999 年) 单位：公斤

项目	1978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粮食	225.30	219.11	231.41	237.86	241.30	231.21	229.67	227.30
食油	1.26	3.19	4.39	6.16	5.89	5.22	4.86	4.83
肉类	6.30	16.58	15.66	17.76	20.87	19.47	23.06	22.89
家禽	0.14	0.49	0.61	0.88	0.95	0.81	0.88	0.80
蛋类	0.30	0.66	0.66	1.01	0.92	0.97	1.10	1.02
食糖	0.56	1.02	0.92	0.90	0.96	0.98	1.00	1.03
酒	1.30	4.82	4.61	5.40	5.41	4.74	4.66	4.24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局：《贵州五十年，1949-1999》、《2000 年贵州统计年鉴》

表 4 显示,考察期间我省农村居民的食品结构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所有种类食品的消费不仅量上增加较快,而且质的方面也得到较大改善。比如在粮食消费平稳增长的同时,其余类食品消费均出现大幅增长的现象,因此,正是由于食品结构的改善使我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从而形成在价格指数影响下的恩格尔系数小范围波动的局面。

②总体消费结构

通过对历年农村恩格尔系数分析，可以看出，我省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经历由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缓慢升级的过程。在食品消费发生量变

和质变的同时，该阶段农村居民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例也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说明我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向逐步合理优化的方向转型。

改革初期，我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住等生存资料占了绝大比重，特别是吃的方面，其消费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讲都远未得到满足，因此在收入水平提高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增加食品消费为主的消费支出。

通过对贵州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构成综合数据观察，可以看出，在 90 年代以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特征是满足生存层次的消费需求，逐步实现由贫困向温饱的过渡，这一时期吃、穿、住的比例一般占整个消费结构的 90% 以上，1978 年所占比重为 93.43%，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少数农民在摆脱贫困后，其消费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吃饱穿暖的情况下着重考虑增加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改善住房和交通通讯条件，并扩大了较低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这一时期农民吃、穿、住的比重有所下降，1999 年的消费比重为 82%，低于改革初期 11 个百分点。总体上表现为由于住房和文教娱乐用品等其他支出比例的快速上升导致生存消费比重的下降。在农民纯收入稳步增长的条件下，恩格尔系数在 1999 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低，其原因除受前述物价指数回落的影响外（1999 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下降 0.9%，食品价格指数下降 2%），也反映出农民生活消费的质量和数量都发生了令人喜忧参半的变化，因为毕竟通过国内国际比较，不难看出，我省农民恩格尔系数仍处于相当的高位，农民的生活依然十分贫困。